



牟复礼教授

顾钧

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的一所著名学府,近年来多次在美国大学排行榜中位居榜首。普大的中国研究虽然很难说是全美第一,但无疑是实力雄厚的重镇,与整个学校的水准相一致。普大今日的成就离不开以往一代代学人的努力,就中国研究而言更是如此。

普大的汉语教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,第一位老师是Robert K. Reischauer,其兄是日后以研究日本著称的赖绍华(Edwin O. Reischauer)。Robert本人对日本也颇有研究,但不幸早亡。1937年夏天,他在上海旅行时正值日本侵华,在一次中日冲突中误伤致死。接替他位置的是饶大卫(David N. Rowe),饶本科毕业于普大,后来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,但在母校教了几年后就跳槽去了耶鲁大学。此后由于二战以及其他原因,普大始终没有一位在岗位的全职中文教师,直到1956年秋牟复礼(Frederick W. Mote)的到来才结束了这一局面。

牟复礼与中国结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二战。1942年底,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,20岁的牟复礼离开刚刚上了一年的大学,应征入伍。当时美国军方急需中文人才,牟被选中派到哈佛大学接受了为期一年的培训。1945年到1946年他作为美国战略情报局(中情局前身)官员在中国工作了一年,这一年当中不仅在昆明、上海、北平和国民党打过交道,而且也在献县、张家口和共产党有过接触。战争结束后牟本来可以去哈佛大学继续学习,但是他选择了位于南京的金陵大学,并于1948年获得了学士学位。返回美国后,他于1954年获得了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学位,逐步成为一位明史专家。从1956年加盟普林斯顿大学到1987年退休,牟氏一直是推动普大中文教学和研究的关健人物,地位堪比哈佛的费正清(John K. Fairbank)。

在饶大卫和牟复礼一去一来的十几年间,普大的中国研究也没有完全停顿,这得力于三位学者的努力。第一位是George Rowley,他是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专家,但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对中国发生兴趣,并无师自通地研究起中国绘画史,从此直到1960年退休,他一直坚持同时教授意大利和中国绘画史。Rowley教授在中国绘画史方面只培养过一位博士生,但此人十分了得,足以以一当十,他就是后来美术史界无人不知的方闻(1958年毕业后一直执教于普大艺术与建筑学系,1992年当选为台湾“中研院”院士)。第二位是政治学系的William W. Lockwood,他生于上海,其父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,所以从小就懂一些汉语。Lockwood二战前夕进入政治学系工作,二战中被借调到美国空军,战后回到普林斯顿继续执教。他所开设的有关东亚政治的课程涉及近代中国的历史、政治和经济问题,

一直作为了解东亚的入门课而深受学生的欢迎。第三位学者是Marion J. Levy Jr.,他1947年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后执教于普大社会学系,他的博士论文《现代中国的家庭革命》于两年后出版。不想见,Levy的到来使普大又多了一位可以教一些与中国有关课程的专家。

三驾马车的工作虽然不无成效,但毕竟有限。牟复礼需要做事情很多。首要的就是恢复常规的汉语教学,并使之成为一门学分课程。牟复礼来普大之前,汉语一直是根据学生的要求来开设,而每年有这样要求的就是二至三名学生,由于不算学分,这三三两两的学生往往满足于知半解,缺乏继续钻研的劲头。在汉语教学正规化以后,牟复礼要做的就是建立中文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体系。经过几年的努力,这一体系推出了首批毕业生,虽然只有本科生一人(1961年),研究生二人(1967年),但无疑建立了一个重要的起点。最早的研究生之一陈学霖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元史专家。

一个好汉三个帮,牟复礼来普大后的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增添人手。1958年正好有进人指标,牟向同事推荐了陈大端。陈当时在印第安纳大学撰写有关清史的博士论文并且同时教授汉语,此前他曾长期在北京生活学习,会讲标准的普通话。这些条件都很理想,陈大端顺利地通过了考核并于第二年9月正式到普大报到。有意思的是,牟在推荐陈的时候并没有邀请他和陈的一层特殊关系:金陵大学时代的同学。这样一层关系显然比光看履历和面试更能深入地

了解个人,牟复礼“举贤不避亲”产生了好效果,此后的事实证明陈不仅科研能力很强,同时也是一位难得的汉语教学高手。

在陈大端之后,又有几位高手被引进到普大。1961年,高友工的加盟填补了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白。名师出高徒,日后以研究明清小说特别是“奇书文体”著名的浦安迪(Andrew H. Plaks)就出自高门。浦氏于1973年博士毕业后就留在了老师身边。1965年刘子健的加入打下了宋史研究的根基,而1971年Willard Peterson的到来则使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。

普大的中国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起一直隶属于东方学系,随着学科和人员的扩大,1969年,东方学系一分为二,成立近东学系和东亚学系,中国研究作为东亚学系的主导学科,终于获得了自己应有的位置。中国研究的基础是汉语教学,普大人不仅研究做得好,基础教学也搞得有声有色,远近闻名。牟复礼在哈佛时就打下了很好的汉语基础,当时主持中文教学的是赵元任,使用的是赵专门为此批军事学员编写的教材《国语入门》(Mandarin Primer)。牟复礼到了普大以后就把赵元任的教材和教学法移植了过来,但这套体系由于太复杂不久就被放弃了。1959年,陈大端全面接手汉语教学工作后,开始探索一种更为简便有效的教学体系,并编写出了包括《中文入门》(Chinese Primer)在内的系列教材。他始终坚持把中文作为一种活用的语言,而不仅仅是书面语进行教授,所以

他教出来的学生个个口语流利,让其他学校的毕业生又羡慕又妒。

20世纪60年代,卡耐基金会会将汉语等几种战略性语言培训的项目建立在普大,正是基于普大原有的良好基础。这个项目带来了美国其他高校对中国有兴趣的本科生,他们在普大不仅得到了为期一年的密集语言培训,还获得了一些基础的专业知识。培训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罗兹曼(Gilbert Rozman)。他参加完1963年—1964年度的培训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学校,但毕业后毫不犹豫地选择到普大读研究生,他后来在社会学方面成就卓著,其所主编的《中国的现代化》(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)一书有中文版。除了为期一年的培训外,牟复礼和陈大端还于1966年开办了暑期中文培训项目。项目采用的还是普大中文教学一贯的三原则:大量的口语训练,通过口语教授阅读,通过白话文教授古汉语。这一项目在普大一直办到1993年,后移师北京,始终备受美国学生青睐,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为一著名品牌。

面对这些成功,普大人并不满足,他们不仅要学好汉语,还要对汉语本体进行深入的研究,并且要把两者结合起来,为此普大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于1966年建立了“中国语言学项目”(Chinese Linguistics Project)。这一项目通过举办讲座、研讨会,出版教材和论文集等多种方式大大推动了该学科的发展。在项目早期,赵元任、李方桂、梅祖麟等著名语言学家都曾积极参与,1967年—1972年还不定期地

出版名为《麒麟》的学术通讯。这一至今仍活跃的项目使普大一直引领着美国汉语研究的潮流。

只要说到普大的中国研究,就不能不提它的中文藏书,后者的名气也许还更大一些。最早的一批中文藏书就是举世闻名的葛思德珍本(Gest Rare Book Collection),约10万册。这批珍贵的文献于1937年落户普大,并最终于1948年正式归属普大。普大人当然不能只守着宝藏而不去开采,对于早期的学者们来说,葛思德珍本的存在是说校方发展中国研究最好和最有力的理由。

这样的宝藏当然必须请专家来管理。1950年—1952年旅居美国的胡适曾担任过葛思德图书馆的馆长(详见拙文《胡适与葛思德图书馆》,《中华读书报·国际文化》2012年10月10日)。胡适虽然当馆长的时间不长,但对普大很有感情,后来曾把私藏的全套伪满本《清实录》赠送给了普大。胡适离开后,馆长一职由童世纲接替,一直担任到1977年退休。



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

童是图书馆学系科班出身,来普大前曾在哈佛燕京学社从事图书馆工作。凭借丰富的知识经验和高度的工作热情,童在25年的任期内大大扩充了普大的中文藏书,使其总量仅次于国会和哈佛而名列全美第三。在扩充的过程中,明代史料的收集被摆在了优先的位置,这当然和牟复礼个人的研究兴趣有一定的关系,但更重要的是他20世纪70年代开始组织《剑桥中国明代史》的写作,需要图书资料作为坚强后盾。明史卷出版后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好评,普大丰富的明史资料可谓功不可没。

葛思德图书馆藏书中大有来头的为数不少,是研究东亚印刷文化和书籍史的绝好材料,普大人一直想创办一份以此为对象的刊物,这一愿望最终落实为《葛思德图书馆刊》(Gest Library Journal,后改名为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),第一期于1986年冬问世。这份刊物作为普大早期中国研究的一部分,是绝不能被忽略的。

勤翻词典,译好文章

——二改拙译《百年孤独》感言(续)

吴健恒

严复说翻译要“信达雅”,把“信”放在第一位。这是好理解的,因为翻译第一要求的是“信”,是要译得忠实于原文。如果连原文也没弄懂,或者对它理解不透,错译或译得太不准,还怎么能谈译得“达”和“雅”呢?

要吃透原文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一般来说,我们进初中才开始学习外语,经过多年学习,我们能读外文文书,能讲外国话了,以为我们运用外语能跟运用母语一样了。其实我们的外语程度,比起我们从来到这世上在摇篮里就咿咿呀呀开始学的母语来,一般都还差一大截。特别是要译外国的文学作品,对译者的中外文水准就要求更严。中文达标就属不易,外文过关就更难。那怎么办呢?据我自己多年学译的粗浅经验,勤翻词典能补拙,翻译中碰到问题请教教一生一世一直默默陪伴在我们身边的良师:词典。

我翻译出版过十来种西班牙语文学作品,逐渐置备了多种西文、西英、西汉词典。翻译中我只要对原文一个词一句话的含义稍有疑问,就去请教词典。词典里的老师现身为我释疑解惑的次数,不可胜数。我现在只举词典帮我脱困,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。

初译《百年孤独》时,碰上了其中的一场狂欢节中的化装舞会,其中出现了四个colombina,这个词

跟colombiana粗看似乎形似,细看差别明显。译者稍不注意,就可能把那四位按后者译成“哥伦比亚人”或“哥伦比亚女人”。可是当时我想,参加舞会的纸牌老K、法国贵族、日本王后等等,都是哥伦比亚人装扮的,怎么能钻出四个化装装的哥伦比亚人来呢。于是为找那colombina,我查遍了手头的词典,终于在两大厚册的原文《西语用法词典》里找到了她,找到了“科伦比娜”,原来她是意大利喜剧中漂亮而活泼的姑娘,是狂欢节中经常有人装扮的人物。找到她,我真感到有点“处处寻寻觅觅,得来别有一番欣喜”的快感。可见翻译得结合文中情景仔细斟酌,勤查各种词典,才能译得正确。

这里我谈了对我们不了解的词汇勤查词典作好翻译的情况。下面我要谈谈我二改拙译《百年孤独》当中,发现我和我的翻译同行自以为了解了原文词义,不去翻词典,从而其译文累出错的情况。

一个单词,往往具有好几个词义,而且越简单的常见词,词义越多。我们拿它出现的频率最多、自己也用得最熟的词义去翻译,不结合文中情况仔细考虑一下自己顺手译出的译文是否正确,懒得去翻词典,往往译出错误的字句来。这方面有趣的错误例子,我并没有细心取,就可以在下面举出好几个来。我举例时将原文缩短但不失原意地译成中文,再将供翻译的原文及其误译译出,讨论应如何正误。

小说开头不久就出现“Una familia de gitanos...”,按文中意境应译为“一个民族的吉卜赛人……”,误译为“一个家庭的吉卜赛人……”的情况,我在此前一篇小文章里已经详谈过了。在此备录以引领下面的误译。

何塞·阿卡迪奥的倩妇皮拉·特内拉拉对他说:“现在你可是个hombre啦。”他没听懂,皮拉就一串串字地对他解释:“你就要有个儿子啦。”这里,译者把hombre译成“真正的男人”或“真成了男子汉嘛,还用皮拉提醒吗?翻词典,hombre可俗称“丈夫”。我觉得皮拉对他讲得够明显了,他就要有个儿子了。因此,这句话我觉得应译成“现在你可是个丈夫啦”才到位。

何塞·阿卡迪奥·布恩迪亚把自动钢琴拆散,想要悟出它里面的奥秘来,结果陷在一大窟“clavijas y martinetes”里面一筹莫展。他不懂乐器,对这两个不熟悉的词义只翻出词典上最初出现的词义来译,错译成“销钉和木槌”。其实只要稍许往词典上这两个词下边的释义看看,就能将它们译成正确的“弦轴和音锤”来。

彼得罗·克雷斯科思求阿玛兰塔跟他结婚不遂,就每天躲到trastienda去给阿玛兰塔写 esquelas desatinadas。这短短一句话里有两个陷阱。trastienda中,tras是“在……之后”,tienda是“店铺”,这词看字面就知道是“店铺后边”嘛,不用翻词典。因此,译者顺手将它译成“店

后”、“店铺后边”,但这样译意思含混,店后也可能是“后街”或者“野外”。翻翻词典,这词分明应是“店铺后室”嘛。译者将“写下 esquelas desatinadas”译为“写下狂热的短笺”,“颠三倒四地写一些短信”。克雷斯科既然每天都写信,按情况就不可能老是只写“短笺”或“短信”,何况那信还是“狂热的”、“颠三倒四地写下的”呢。查词典,“esquela”外,现在也可用作 carta,即“信”。因此,这句话应译为“他就每天躲到店铺后室去给阿玛兰塔写痴狂的信”才对。

一杯掺有毒药的咖啡,几经转手送到了奥雷良诺·布恩迪亚上校的 despacho。译者不假思索,将这外国词译为他记得清楚的“办公室”。可是,偌大一个办公室,咖啡搁在哪里,上校能发现它拿上吗?谋害能成吗?翻翻词典,despacho也释义为“办公用品(如桌、椅、柜等)”。因此,这句话译成“……放到了上校的办公桌上”才合适。

乌苏拉抱怨,十几个被谋杀的奥雷良诺兄弟在坟墓里尸骨未寒,奥雷良诺第二就在家闹,“就好像死的不是 cristianos 而是狗一样”。译者把那外国词译成“基督徒”,没错嘛,cristiano就是“基督徒”嘛。可这么直译读起来总觉得不太顺。查查词典,这个词也可释义为“(口语)人”。看来,译成“就好像死的不是人是狗一样”,才算顺畅。

举误译的例子从小说开头开始,现在就以小说末尾的一例结束吧。

“Todas las hormigas del mundo 正在把那块人皮往蚁穴拖去。”译者钉住这几个外文词的字典词义,把这句话译为“全世界的蚂蚁一齐出动,正在把那块人皮往蚁穴拖去”。只要稍稍想想,布恩迪亚家族第七代刚生出来的孩子的那块人皮,能供全世界的蚂蚁来拖吗?查查词典吧,todo el mundo 释义为“大家”嘛。因此,这句话应译为“蚂蚁倾巢出动,正在把那块人皮往蚁穴拖去”。

我二改拙译时还发现了其他几个因不翻词典而误译的译例,但浮光掠影,一过即忘,回忆不起来了。可是,从以上所举的这几个误译译例就可看出,翻译时对原文中的词义有了点疑问,或者自己以为不存疑,不去请教身边那些词典中的严谨的老师,就把自己记得最熟、似乎跟该译出的用词挨了边儿的词轻易套上,那不出错才怪。翻词典,光看看要译的词的解释跟自己原已熟悉的用法相合就中还不行,还得进一步考虑用那词是否恰合文中意境,“打破砂锅问到底”,直到找出恰当的用词才罢休。其实我举的几个误译的正译,并没有多去找那西文、西英词典,绝大部分都是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的《简明西汉词典》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的《新西汉词典》中找到的。这两本西汉词典,勤翻就解决了大问题。翻译时把词典搁在身旁不用上,实在可惜了。

我谈了这么一通,其实我弄自己喜欢的业余西语文学翻译,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回首过去,我无端浪费了多少宝贵至极的青春年华!今天,我只能满心盼望,比我年轻的,从事西语文学翻译的同行朋友,趁这打扰上的美好岁月,静下心来坐冷板凳,勤翻词典,译好文章,多多译出让我羡慕欣悦的西语文学佳作的佳译来。

本版推荐

李永强

作为周南老师的学生,多次有机缘聆听老师对人为为事的独到感悟。对中外文化的精妙分析,对品牌经营之道、市场竞争之术的独创见解,周老师总能见微知著,于平凡处见非凡。无论是课上就课外,他总是信手拈来,妙语连珠,让我们时刻沐浴在智慧中。

《要钱还是要命——道德经的启示》一书共收录60篇随笔,是周老师跨入耳顺之年对营销、品牌、人生、未来的感想,更是他一生心迹的回顾。全书共分六部分,每篇短文左右两页,左为正文为副,以达“形”、“象”互补之效。第一部分主要分享为人处世的众多感悟,第二部分重点关注的是中美文化的比较与分析,第三部分侧重阐释品牌经营之

道,第四、五两部分分别讨论无为之道和“名人”之道,最后一部分则是周老师求学心得的分享。

咋一听到书的标题,就觉得新奇有趣。“要钱还是要命”,很多中国人其实并不清楚“钱”和“命”哪个更重要,因而乐极生悲,泰极否来。老师认为,“钱”是生意、事业、品牌,而“命”是人生、人类、地球。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、也是秩序经济,做营销、塑品牌时往往想要钱多,而知“法”少,要钱不要命,原因在于对“道”理解浅、领悟少,只知战天斗地,不知这只是过程或者手段,而忘了“欢天喜地”的目的。周南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,赚钱之道是小“道”,求命之道是大“道”,而“法”自然之道才是更大的“道”(无穷大)。结合道家的观点和言论,老师对许多具体企业管理问题都进行了简短却又精辟的讨论,让人顿

感醍醐灌顶,耳目一新。

周老师长在福建,学成于美国,生活工作于加拿大和香港,可以多视角审视中国的文化。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,该书重点比较了美国的牛仔文化、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。作者指出:美国文化侧重于“以物为本”,更关注“钱”,偏向于追求外在的“他胜”,即战胜他人。中国的儒家文化则侧重于“以人为本”,更关注“命”,偏向于追求内心的“自胜”,即战胜自己。无论是自胜还是他胜,均是自胜。而道家文化追求回归自然。老子推崇“不争之德”,说“天之道,不争而善胜”,圣人之道是“为而不争”。每个人心中对生活的有着太多的愿望要实现,对自己的人生有着太多的期许。生活却不断动态展示喜怒哀乐、爱恨情仇、凌云壮志、颓唐消沉,而现在,《要钱还是要命——道德经的

启示》让我们从空中回到了地面,知道了脚踏实地,知道了平凡中的伟大,知道了“为而不争”之德。

就营销学研究而言,该书让我们感悟到,中国人做中国的研究,特别是中国情境的研究,首先要中国人喜欢,就如同川菜首先要川人喜欢。外国人在中国问题,也可能因为我们身在此山中,他们旁观者清,也可能非常深刻、独到。换句话说,做研究如同唱京剧,大多数中国问题研究,是借用西方的学术词汇生搬硬套,这与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唱京剧一样,虽然不伦不类,倒也算用心良苦。其中一些更是对西理论全盘接受,生吞活剥,盲目照搬,还名其曰国际化研究视野,这与穿比基尼唱京剧有何分别?我们追求的中国情境研究应该是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似的。先形似,再神似,再形神兼备,再有

自己的风格。周老师认为,培养学生最怕一年土,二年洋,三年不认爹和娘。我们不能只做名义上的中国人,而要做精神上的中国人。

就为人做事而言,该书教导我们:只有圆融做人,圆通做事,最后方能结局圆满。三个圆都是工具,融、通、满是结果。做人圆融难度最大,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个差序格局,圆有内外、大小,但不同圆之间没有贯通,差异应该尽量削弱。

要钱还是要生活?借助金钱,现代人的大多数需求和梦想都可以得到满足,然而,这不是过日子——这只是在消费。我们绝大多数时间都用在在工作上,遗憾的是,大多数数人是为了赚钱才去工作,然而,要过令人满意的生活,真得要赚那么多钱吗?林语堂先生说:“有钱的人不一定能真正领略悠闲生活的乐趣,那些轻视钱财的人才

真正懂得此中的乐趣。他须有丰富的内心,有简朴生活的爱好,对于生财之道不大在心的,这样的人,才有资格享受悠闲的生活。”这与周老师所解异曲同工:心之缘,财之源。

作为中国营销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教授,周老师以《道德经》来诠释人生哲理、企业营销和品牌管理之道,视角独特。他对《道德经》的评析见解独到,深刻精辟,“析义理于精微之辨,辨字句于毫发之间。”全书文约而义丰,有很多精妙的见解,值得企业家、营销学界中人仔细钻研。如何以老子“道法自然”的思维来调剂浮躁的俗世,以达到“物质与精神”的双赢,此书实为当今献上了一剂清凉妙方——阴阳共生,钱命平衡。

(作者为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)

阴阳共生,钱命平衡

——读周南教授新书《要钱还是要命》有感